

辞书研究

3

1980

C
I
S
H
U
Y
A
N
J
I
U

141	郭育英	《俄语疑难辨析》
147	郭晨光	《双语词典的条目》
150	夏振中	《综合技术词典》
153	〈资料〉	苏联的一些辞书

问题讨论

157	“语文词典有没有阶级性问题”座谈纪要	
173	严北溟	谈谈一部古佛教辞典——《一切经音义》
197	金文明 王 涛 斯英琦	谈谈《辞通》
221	朱起凤(遗著)	古欢斋杂识
232	刘 锐 蒋人杰	《说文解字》研究刍议

辞书杂谈

181	杨荫深	试谈编写中型辞书
184	祝敏彻	谈谈“同”和“通”
186	方福仁	释义问题随想
188	周本淳	何谓“周星”
190	祝注先	关于“𠮩”的一个义项
192	傅憎享	“𤝵”是什么？
193	何宗智	廖振佑 发菜生长在水中吗？
195	杨剑桥	关于“不借”
240	孙公望	汉字查字法的回顾
248	叶楚强	谈“义序”
251	夏允中	汉字笔画笔形检字法应该规范化
255	景幼南	一种设想

257	《政治经济学辞典》编辑部 《政治经济学辞典》 的编写工作
264	边 伟 《法学词典》简介
266	陈光裕 《世界地名辞典》的编写和定稿
辞 语 人 物	
208	屠基诒 一位可敬的训诂学家——朱起凤
215	劳 正 达里和他的词典
辞 语 资 料	
273	方厚枢 建国三十年来出版辞书编目(续二)
285	李大忠 词典学论文索引
辞书之窗·答读者问·补白	

辞书研究 第三辑

1980年9月

编 辑 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出 版 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书号 17187·39

每册定价 0.77 元

同心同德， 编好《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字典》领导小组组长 许力以

积累人类社会的文化，向人们提供综合性的广博知识，这是编撰辞典的出发点。我们组织编撰的《汉语大字典》，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总结前人研究汉字的成果，向读者作简明的介绍。

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到楷书，汉字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丰富的材料，而且愈到后来保存下来的材料就愈多。拿楷书汉字来说，它有好几万个。这些汉字有的今天还在使用；有的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在古代的典籍里还可以看到。系统地整理这几万个汉字，弄清它们的历史源流和演变，弄清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注明它们的读音，这些就是《汉语大字典》的任务。

作为一部提高性的字典，以方块汉字为对象说明它的形音义各方面的特点，这样的字典目前还没有，《汉语大字典》的编写正是为了

填补这个空白。就这个意义讲，这部字典有自己的专门任务，它不会跟别的词典重复。当然，某些解释，某些例句会跟别的词典重复，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只要各个字典、词典编写组都根据自己所承担的字典、词典的对象、任务和规模进行工作，那末各个字典、词典都会显示它自己的特点。

字典的编写，可以推动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古文字的研究，汉字的整理，还有一些语言学方面的课题，通过字典的研究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解决。编写字典还可以同培养科学研究队伍结合起来。目前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通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编写实践，必然会培养成为一批这方面的专门家。

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康熙字典》，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年，但是还没有失掉自己的意义，解放后还多次重印。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它对《康熙字典》有修正也有补充。解放后也重印过。在新的大字典编写出来之前，这些字典还是受人欢迎的，有它们一定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年了，我们早就应该有一部反映我们时代水平的大字典，但是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我们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今天，我们有了比以往更好的条件，有了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比当年编写《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的队伍要大得多；同时又组织了编委会，实行集体领导，进行科学分工，更有利于工作的进行。目前收集资料和试编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要把大字典编成，还要进一步努力。我们坚信，只要发挥编写人员的积极性，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埋头苦干，这部大字典一定能够编好并且早日与读者见面。

《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

《汉语大字典》副主编 李格非 赵振铎

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已经四年了。回顾这段时间的工作,由于以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由于我们对编写这样的大型字典缺乏经验,在编写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但是,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我们对字典编写工作也有了一些了解。下面准备谈一点我们的认识,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谈编写字典的必要性。

编写《汉语大字典》的必要是为汉字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块汉字是表意系统的音节文字,它在世界文字中占特殊的地位。这种文字从殷周甲骨文到今天连续不断几千年,经过了若干发展阶段,字体有了多次变化。现在能够看到的楷书字有好几万个。而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只有那么几十个字母来记录语言的词,所以没有必要专门编写解释字母的字典。汉语的情况就不同了,记录汉语的汉字有几万个不同的形体,学习汉语,汉字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汉字的构造是有规律的,但是几万个汉字却各有各的历史。认识到汉字的这个特点,就可以理解编写出一部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的字典是如何必要了。

我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它们记录了我们祖先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对社会科学或自然科

学都有重要意义。发掘整理我国历史遗产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这一工作中字典又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东汉时期，许慎整理了小篆，编出了《说文解字》，这是我国最早的字典。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字体在变化，字数在增加，旧的字典不能满足需要，就有人编写新的字典。晋朝吕忱的《字林》、梁朝顾野王的《玉篇》、宋代司马光等人的《类篇》、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都是适应这种需要编纂出来的。清朝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人奉敕编写《康熙字典》，宣统元年又开始编写《中华大字典》，这部字典出版时，清朝的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可见编写字典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由政府领导，组织集体力量编纂字典的经验在今天仍然值得吸取。

本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出版了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它在楷书字头下根据《说文》收列了那个字的小篆，有古文、籀文或体的也一并收列。后来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沿袭了这种方法，增收了甲骨文、金文、隶书和草书等形体。近年我们编写语文词典，采用字典词典分别编写的办法。词典不解说字形结构和演变，这就需要有一部字典来承担解说字形结构和演变任务。《汉语大字典》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

二

再谈《汉语大字典》的特点。

既然把《汉语大字典》作为一部大型的语文性的字典来编，就应该考虑到它和其它词典的区别。这也就是大字典特点所在。几年的编写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汉语大字典》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特点，没有专门特点，它就不可能有存在的价值。《汉语大字典》的专门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 收字多

原来曾经设想，大字典收字要多，凡是楷书单字都应该收列。也有一些朋友向我们建议，大字典收字要全。将来大字典出来后，

凡是发现一个不认识的字，在它里面应该都能够查到。我们也曾按照这个建议作了收字工作的部署。但是经过实践，这个要求是做不到的。且不谈那些还没有发现的楷书汉字，就是历代文献上的楷书汉字，《汉语大字典》能不能收录无遗也是问题，比方清朝末年有一本纪载国外情况的书，为了音译外国国名和地名，用“口”为偏旁创造了许多汉字，这类字《汉语大字典》是不是要收就值得考虑。古俗文学作品中不规范的异体、讹字很多，如果字字如录，则将收不胜收！还有前几年颇流行的某些小说作者新造的字就不少，其中有许多是本有其字用不着再创造的。字典收字要考虑它的规范性，收了它就等于承认它，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对于其中有些字，不妨稳一些，先看一下，不忙于收录，过了一定时间，发现它们确有生命力，到字典修订时，再收录也不为迟。

《汉语大字典》收多少字？初步估计在六万左右。这是考虑到三十年代拟议编写的《中山大辞典》已经提出了收字六万的数目，新编《汉语大字典》的字数不应该比这个数目少。如果以《康熙字典》作为基础来考虑，这部字典连同它的不列目字总数将近四万九千（这个数目尚待进一步核实）。加上《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不见于《康熙字典》的字，字的总数就超出了五万五千。再加上重要古籍里一些《康熙字典》不收的字，出土文物中有确定音义的新见楷体字等等，《汉语大字典》收字总数可能超过六万。

2. 对汉字进行一次初步的整理

编写字典本来应该在全面系统地整理汉字的基础上进行，但是这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不是少数人几年时间能够办到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出版又刻不容缓。不可能等汉字清理工作告一段落再来编写。只能一边整理，一边编写，同时进行。

整理汉字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清理异体关系，一是剔除讹字。

汉字字数繁多,有许多异体字。据我们初步统计,《康熙字典》收字不到五万,其中就有异体字二千多组,涉及到两万多个字。《汉语大字典》收字六万,其中异体字的数目会更多。大字典编写工作中清理异体字的目的在于弄清复杂的汉字体系中的异体关系,它和汉字改革工作中去繁就简减少字数,以利目前应用的目的不同。异体字是一个历史现象,有些异体字之间音义全同,处理起来困难不大。有些字本来是异体关系,后来其中一个字有了新义,如《说文》里记载“𠂔”是“虞”的重文,也就是说这两个字有异体关系。但是“𠂔”字又表示古代少数民族耳饰,“虞”字没有这种情况。对于这种类型的异体关系,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讹字就是错字。讹字数量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旧字书没有把讹字专门区别出来。有的对处理讹字看法也不一样,甲字书认为是讹字,而乙字书却认为是属于异体字。《汉语大字典》要求把真正的讹字从正编中剔除,放到附录中去。有人说“校书如扫落叶”,在编写大字典的实践中,发现和认辨古讹字也如扫落叶。如旧字书的豕部有个“豨”字,据说见于《石鼓文》。遍查《石鼓文》的历代拓片,都没有发现这个字,和它形体相近的只有一个“豨”字。象这种讹字,发现了当然放入附录。而没有被发现的,那就有待今后努力,发现了再从正编剔除出去。

3. 反映汉字的结构演变

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形体变化的情况很复杂。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字形结构和变化是《汉语大字典》的一个重要特点。大字典的体例规定,凡是有古文字形体的单字,在字头之下依时代先后列出该字从殷代到魏晋的有关各种形体,注明出处,并简要地说明这个字的原始结构和发展演变。这一部分应该是《汉语大字典》的一个独立的部分,不并入有关义项的释义解说之中,但是必须注意与注音、释义密切配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4. 提示汉字字音的历史变化

关于汉语语音的发展,专家们已写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但是要利用这些成果来给所有的汉字注音还是感到资料不足。从前有人设想用五段标音法来叙述汉字字音的变迁。这五段是：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宋、元明清。这个设想固然好，但是遇到的麻烦很多。经过再三考虑，我们采用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标音法。

上古音主要指“诗经音系”，它的声母虽然已有一些结论，但要把所有上古用过的字都标出声类还是困难的，有些有争议的问题不好解决。因此上古音只标韵部，分三十一部标注。

中古音以“切韵音系”为依据，在选择反切上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方有些反切从音理上就讲不通。这就应该弄清这个反切的来源，然后再确定取舍。

至于字的现代读音，可资利用的字音不到三万。还有一大部分属于异体字，标注起音来还勉强可以对付。有少数字要注现代音比较棘手，这就要求认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5. 严格控制单字下带出的复音词

“字典就是字典，词典就是词典”。这是刚开始编写工作的时候一位同志提出来的。话是说得干净利落，但是具体办起来问题不少，在这方面的确走过一段弯路。现在认识到，《汉语大字典》还有它的姊妹篇《汉语大词典》，它是以收词为主的，收了大量复音词，大字典又有什么必要多收复音词呢？因此，几经斟酌，最后确定了单字条目下原则上不收列复音词。

这样的决定也会遇到另一方面的问题。某个单字只在某一复音词中才有某一特定的读音，如“龟”字在“龟兹”这个复音词中音qiū；某些单字是出现在复音词中，如“苜蓿”的“苜”，“榦榦”的“榦”等；也有一些字，最早出现于复音词中，后来才单用，如“蠊”字最早与“螳”字组成“蠊螳”一词，表示蝙蝠。后来单用表示高脚蟹；“鼈”字最早与首字结合，到了宋朝才单用等。对于这些情况，字典还是要考虑处理的。《汉语大字典》在为了存音、存字、存源的情况下适当收列了一些复音词。

以上仅是目前对字典的特点作了一些设想,还极不完备,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使大字典具有自己更鲜明的特点。

三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编好大字典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们的体会极深。回顾“四人帮”横行的日子,一会儿要“评法批儒”,一会儿又是评《水浒》;今天反击“右倾翻案风”,明天批判“唯生产力论”;时而学“朝农”,要和旧字典“对着干”;时而又要到工农兵中去“开门编字典”。我们有一年多的大好光阴就在这种折腾中浪费掉了,而那段时间正是我们资料建设的重要时刻,那时煮的“夹生饭”,带来的后遗症,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全国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字典工作也有了起色。

八十年代是四化建设的重要年代,我们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力争早日把这部大字典编出来。

《近日来华外国人名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最近编成《近日来华外国人名词典》一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小型词典共收与中国近代史事有关的来华外国人二千余名,见于著录者大致具备。选录的人包括 1840—1949 年间来华的参赞(秘书)以上外交官,重要口岸领事官,海关、盐务、邮政等机构的主管职员,政府顾问,著名传教士、军人、商人、汉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新闻记者及其他人等。同时酌收若干 1840 年以前来华、在中外关系史上有影响的外国人,如著名的明清耶稣会士、重要外交使节、军人、新教早期传教士和“先驱”商人等。姓氏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书末附有汉(译)名音序索引及检字。每一条目大体有如下一些内容:原姓名(拉丁化),生卒年,国别,汉名,官方译名或惯用译名,规范译名,来华年代,在华主要活动和履历,及所编著的有关中国的著述等。

(吴名)

《汉语大字典》义项问题初探

《汉语大字典》编辑部 成于思

字典编写的灵魂在于释义。一部字典的质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释义的妥当与否。而建立好义项是释义的首要问题，这就涉及到在字典义项中对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处理；词素义和修辞用法的处理；词类的活用和词的使动意动用法的处理；汉字通假的处理以及古书旧注在字典义项中如何对待等问题。下面就《汉语大字典》在编写过程中的一些作法结合《汉语大字典》第五次编写工作会议上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字典的义项。就我们接触到的，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包括在字典里的每一个意义就是一个义项。这个提法好象也干净利落，但它对于建立义项帮助不大。在编写实践中不能够从这个说法中得到建立义项的任何启示。也有人认为，建立义项应该考虑到词义是语言的词义，从这方面来给义项下定义。这虽然有道理，但是语言的词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考虑词汇学上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如词义的特征，词义概括和客观现实的相互关系，词义的概括性和词在上下文中的作用，词义的系统性，词义的发展变化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义项问题也很难讲清楚。

发表在《词典研究丛刊》第一期上的《义项的建立与分合》一文的作者张清源同志，对什么是义项有较多的说明，她认为建立义项，首先是以词的固定的理性意义为基础。她采用了排除法，指出：

（一）词义的临时变体不应当建立义项；

(二) 词的修辞用法不应当建立义项;

(三) 词的语法意义和功能不应当建立义项;

(四) 一个词(或字)连同它的上下文一起产生的意义,不应当作为该词(字)的义项。

排除法缩小了探索义项的范围,它的基本方法是把非义项的东西排除了,剩下的就是义项。尽管这个方法不是一个完善的方法,但是在今天处理义项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法。

解决字典的义项,还应考虑到汉字的特征。汉字是表意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和汉语中的词有密切的联系,但不是同一物。《汉语大字典》就是要从语言的角度来把字义解释清楚,使读者了解汉字在记录汉语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字义主要就是单音词的词义。

从编写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分析归纳义项是一件十分繁难的工作。由于分析归纳义项的原则不同,同是一个字而不同的字典编写出来的义项数目相差很大。如“打”(dǎ)字,宋朝人就已经注意到它使用频率高这个问题,并进行了研究。如: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打),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挝作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舟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投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

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也有论及“打”字的:“其于打字,用之尤多,如打迭、打听、打话、打清、打量、打睡,无非打者。”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中对“打”字也有论述:“今俗谈谓打鱼、打水、打船、打伞、打量之类于义无取。”

《现代汉语词典》在单字条下列了二十四个义项,而《辞海·语词分册》则仅收了五个义项。对于“打”字,《辞海》的③④两义则可以把《现代汉语词典》后面的十九个义项全部包括进去。尽管《现

代汉语词典》把“打”的义项分得很细,但仍没有把“打”的意义全部包括。如“打伞”、“打帘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便找不到十分准确的解释。把这样的“打”放在“举”义下,似乎也不够确切。“打帘子”未必就是“举帘子”。把“打灯笼”、“打伞”、“打帘子”等同起来作“举”义的例证,若要细加分析,这三个“打”,又未必相同。有人可能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再看“行”字,《辞海·语词分册》收三十三个义项,《中华大字典》则收二十八个义项,《中文大辞典》则收了四十八个义项。“言”字《中文大辞典》列二十三个义项,《中华大字典》列三十九个义项,《辞海》列七个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列四个义项。由此可见,对义项的分析若没有一个一定的共同遵循的明确具体的原则,在分析归纳义项问题上必然会出现粗细不同。

分析归纳义项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尊重语言实际。一个词有什么意义是社会中使用同一语言的人,在他们的言语实践中反复使用,约定俗成的,词义体现在使用它的那些语言中,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了的。词之所以成其为词,是因为它具有使用这个语言的人集体共同的理解意义。因而,分析归纳义项必须从语言实际出发,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义项则须反映词义的本来面貌。如:

“臭”(chòu),现一般都指“气味难闻”,而原来是“泛指气味”,(其臭(xìu)如兰)。“臭”作为“气味”讲是有语言材料作为根据的。

又如:“号”《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蒲松龄《富贵神仙》第十二回:“展卷挥毫,展卷挥毫,完了一篇日未高,忙着拿出了号。”

今天还说“写号”、“歇号”这个“号”可以指“某种地方、处所”,应该考虑建立义项。又如:

“虚”,《吕氏春秋·辨土》:“不知其稼居地之虚。”高诱注:“虚,亦希也。”魏源《吴农备荒议》:“地虚则行根易远而深。”司农司《农桑辑要·蒜》:“蒜畦栽,每窠先下麦糠少许,地宜虚。”以上

三句中的“虚”，可以归纳建立“(土地)疏松”这个义项。同时，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它自身的本质特征，在分析归纳义项时，不该把非语言本质的东西强加给语言，不该把词义本身并不固有的东西加进去。但有的词有使用范围和意义色彩的差别。如某些词只用于一般场合，某些词用于较庄重的场合，某些词含褒义，某些词含贬义等等。编写字典建立义项时应该考虑词的这些特点，把它们纳入释义之中。但切记慎重，不可轻易判断一个词是褒是贬。

二

再谈大字典收列义项的范围。

《汉语大字典》的义项收列是由《汉语大字典》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汉语大字典》要帮助读者解决在阅读和研究古今中外著作中遇到汉字形、音、义方面的问题。它包括解形、注音、释义三方面。在处理义项问题时，要区别开造字之义和用字之义。凡属造字之义就放在字形解说之中，凡属用字之义，列入释义部分作为义项。至于造字之义和用字之义无法区别开时，则在解形和释义两部分分别处理，注意避免重复。

我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为字典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大字典要尽可能收录单字的义项。凡是见于古文献信而有征的义项都应该收录。但是由于我国语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传统的语文学(所谓“小学”)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它的注意力集中在经学方面，对先秦文献语言的研究多一些，其余时代虽有研究，但是成绩不如先秦大。近几十年学者的视野扩大了，研究了更多的不同时代的语言，发现汉晋到元明清这段时间汉语词汇发展的内容非常丰富。一部大字典应该打破经学的附庸，广泛收集各个时代单个汉字的义项。这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作了一定的努力，但还是很难尽如人意。

现代义项的收列应该考虑到它的规范性，收列方言义项要从

严掌握。但有些极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它使用了某一方言词,又在作品中经常出现,以致在普通话中逐步取得了地位,这个方言义项就应当收列。如:

虎,本义是老虎,猛兽名。《说文·虍部》:“虎,山兽之君。”茅盾在他的作品中多次使用这个词。例如:

《春蚕》:“老通宝虎起了脸。”

《尚未成功》:“于是他就虎起了眼睛。”

《霜叶红似二月花》:“那圆眼浓眉的男子此时也似乎怒气略平,但一听人家笑了,他又虎起眼睛,重复挑战道:……。”

在著名小说《子夜》中引用了好几次:

“吴荪甫陡地虎起了脸,勃然骂道:……。”

“他虎起了脸,踱了几步,看看那位坐在沙发里吸鼻烟的杜竹斋。”

“杜竹斋回过脸来,却看见吴荪甫脸上虎起了狞笑。”

近年来,在不少期刊上也出现了“虎起脸”“虎起眼”的用例。这说明“虎”这个方言用法影响很大,它已不是虎的本义,而是表示面部表情的变化,这种方言义项字典应该收列。

一个汉字只记录一个音节,而汉语的词既有单音节的,也有多音节的,因此,一个汉字可能是一个词,也可能是一个词素,甚至可能是一个不能单独表义的音节。汉字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应该在字典中得到反映。作为一部字典来说首先应该收单音词的词义,对于不能单用仅见于合成词中的词素义,也不应该忽略。

词素义存在于合成词之中。至于联绵词,如:踟蹰、犹豫、从容;迭音词,如孜孜、寥寥;音译词,如:葡萄、马达,这些单纯词,一个字只代表一个音节,没有意义,要两个音节合起来才表示一个意义,这就不存在提取词素义的问题了。合成词中的词素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才可能提取出词素义;要有一定的构词能力,这才证明这个词素使用较广,而且我们要从一定数量的合成词中才能概括出词素义。词素义与单用时的词义相比要有所变化,这才有提取词素义的必要。

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合成词的词素义，把同一类型的合成词的意义加以比较，抓住其意义上的共同点加以概括，努力发掘汉字的新义。凡符合上面三个条件，就应该考虑提出词素义，并作为义项收列。如：“手”本义是“人体上肢前端拿东西的部分。”《说文·手部》：“手，拳也，象形。”而在选手、好手、能手、多面手、红旗手、拖拉机手、打手、凶手等合成词中，“手”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而是指“擅长某种技能或从事某种工作的人”。这是因为做事一定要用手，所以称做事的人叫“手”。从指手到指人，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应该从这些合成词中提取共同的词素义：“擅长某种技能或从事某种工作的人。”

又如：“家”，本义是家庭的住所。《说文·宀部》：“家，居也。”在儒家、道家、法家、一家之言、百家争鸣等合成词中，指“学术流派”；在专家、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教育家等合成词中，指“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在酒家、店家、船家、渔家等合成词中，指“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在女人家、孩子家、姑娘家等合成词中，“家”变成了虚词素，用在某些名词后面，表示属于哪一类人。这些词素义都已得到社会的承认，应该分别建立义项。

汉字通假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古人书写的时候，由于音同或音近，常把甲字误写成乙字。相沿既久，得到社会的承认，乙字也就具有了甲字的意义。不了解这种通假现象，读古书时就难免望文生训，误解原意。因此，收录假借义也是《汉语大字典》的重要任务之一。

古书中通假现象很普遍，如果凡有通假现象就立通假义，那将收不胜收。《汉语大字典》在收录通假义时将严格控制。通假义应只限于雕版印书中流传下来的较为习见的通假现象。这是因为雕版印行的书，流行既久且广，影响大，有一定的社会性，应予以收录。《词典研究丛刊》第一期上发表的甄尚灵同志的《通假义试探》一文中对字典的通假义项作了一些规定，看来是可行的。